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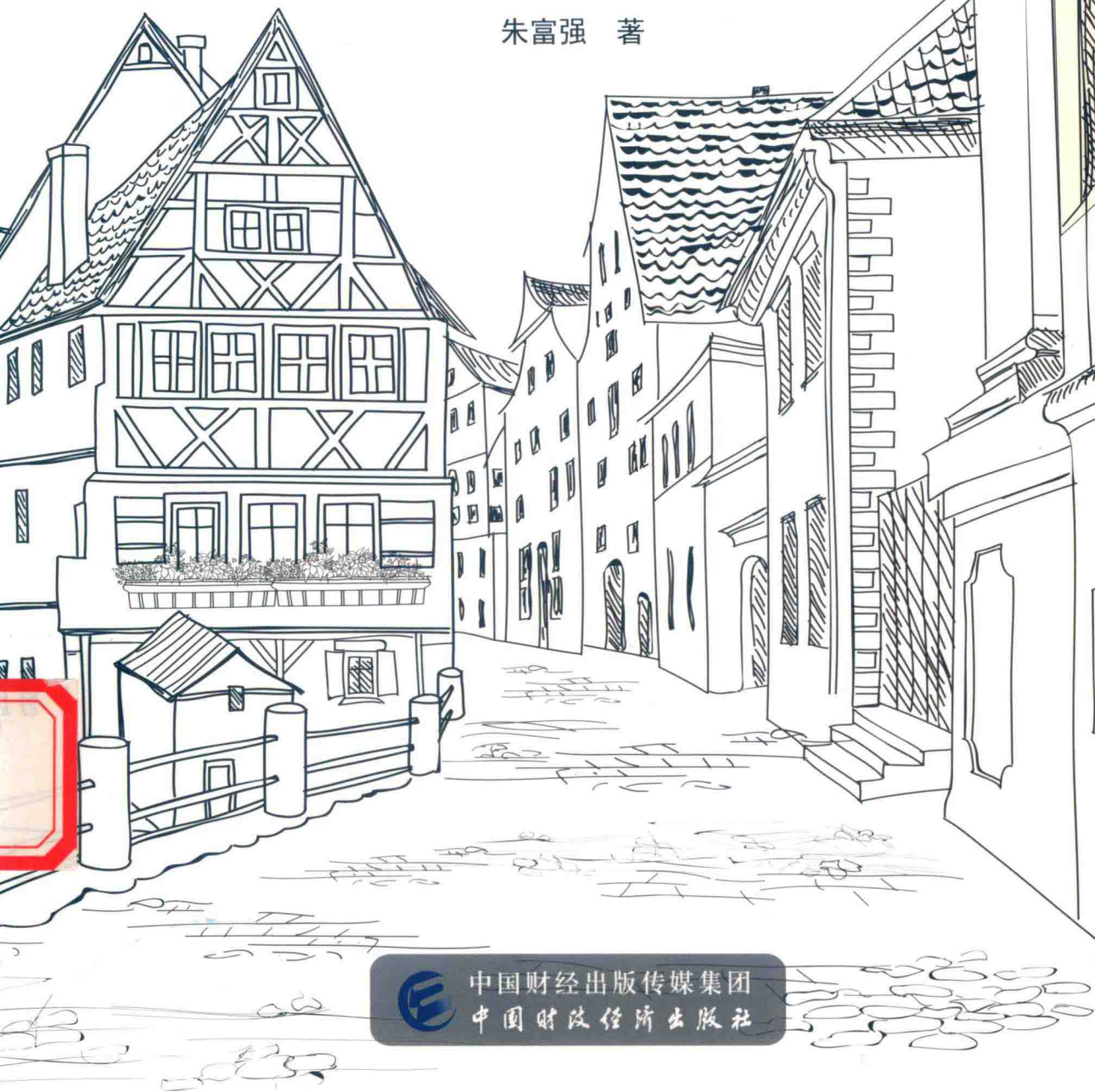


“十三五”普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

高阶 西方经济学说史

——思想的鉴与释

朱富强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十三五”普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

高阶西方经济学说史

——思想的鉴与释

朱富强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阶西方经济学说史：思想的鉴与释/朱富强著.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1

“十三五”普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

ISBN 978-7-5095-7934-3

I. ①高… II. ①朱… III. ①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F0-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9358 号

责任编辑：王 芳

责任校对：陈世明

封面设计：肖玉坤

版式设计：王志强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jiaoyu@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100142

营销中心电话：010-82333010 编辑部门电话：010-88190670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6 开 20 印张 507 000 字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49.00 元

ISBN 978-7-5095-7934-3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010-88190744

打击盗版举报热线：010-88190414、QQ: 447268889

广益教育“九斗”APP 操作说明

本书为“互联网+”立体化教材,配有广益教育助学助教平台——“九斗”APP。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使用。

步骤一,先使用智能手机扫描本书封面图标中的二维码(见下图),下载安装免费的“九斗”APP。提示:下载界面会自动识别安卓或苹果手机。



步骤二,安装成功之后,点击“九斗”APP 进入使用界面。

步骤三,首次使用请先注册。如果您是教师用户请提交资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即可获得教师的相关功能。

步骤四,注册成功后,按照软件提示或宣传视频操作即可。

提示:

1. 浏览资源请先扫描封底二维码进行教材验证;
2. APP 中配有自测题、经济学的故事等扩展阅读材料。
3. 教材中的二维码资源请使用“九斗”APP 中的扫一扫功能扫描二维码进行浏览,也可在 APP 里列表式阅读。

在使用过程中,如有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010-82330186、13811568712

客服 QQ:2158198813

电子邮箱:kf@guangyiedu.com

前 言

本书是《西方经济学说史——思想的源与流》的姊妹篇，主要是对教材所介绍的经济思想作进一步的深化理解，进而为读者更深刻地认识理论和现实提供启迪。本书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①主要学说鉴识，以延伸阅读的形式对经济学说史中的一些重要理论作深层次的鉴识，目的在于深化读者对这些理论的认识，进而提高读者的批判性思维能力；②经典问题释疑，以议题释义的形式对平时遇到的一些经典问题进行系统性的解析，目的在于促进读者对相关理论的理解，进而拓展对现实社会现象的认知；③基础概念释义，对经济学中经常用到的一些概念、术语、定理以及规律等进行简明而准确的阐释，进而有助于提升读者对经济学说史乃至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思维的学习和运用。事实上，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培养考据式的经济思想史专家，而是为了提升经济学人认识现代经济理论和理解社会经济现象的能力。

同时，由于经济思想史在时下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中严重式微，导致各经济院校所使用的经济学说史教材也主要是欧美译本。显然，这些引进的教材主要基于西方人的思维和认知，并且也主要局限于发生西方社会的历史实践以及相应的思想总结。相应地，这些教材所阐发的理论就必然会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存在严重脱节，也与中国经济学人的历史知识和理论知识结构存在巨大差异，乃至很多经济学子都将经济学说史课程视为与现实无关的“记诵”学科。

鉴于此，在过去的 10 多年间，笔者在对经济学说史进行系统梳理、比较和提炼的同时，往往有意识地将中外的历史和现实与经济学说史上的思想联系起来，并致力于从文化传统和哲学思维两方面对这些理论进行深层审视，这充分体现在这本书中。正因如此，本书就不仅对经济学专业的学子和研究者是有益的，有助于提高对经济学认识的系统性、全面性和深入性。而且，对关注社会现实和发展的所有学人也都是有益的，因为本书提供了人类所积累的哲学、社会性、法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以及宗教等方面相关知识，进而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思考社会的发展和人生的意义。

事实上，本书之所以有助于提升读者对经济学理论和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重要原因在于本书在梳理经济思想的历时性发展时致力于如下四个“结合”，这四个结合充分地嵌入在主要学说的评鉴以及经典疑义的解析上。

第一，重视经济学说与经济史的结合。要真正理解经济思想和理论，需要将它与经济

史联系起来,将理论契合进历史的分析中。其原因是:①任何经济理论都只是反映了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现象,只有将理论与历史结合起来,我们才能从整体上审视理论的发展;②经济理论作为经济现象背后的一般规律离不开一个个具体的事实,而经济史正是提供了这种丰厚的史实;③有益的经济理论不仅要经受得起逻辑和现实的检验,还必须经受得起历史的检验,旨在置于历史背景中才能对之做出恰当的评判;④正是不同时空下主要问题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理论学说和流派,因而契合经济史可以更好地认识现代经济学的结构体系,更好地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⑤人类社会的发展往往呈现出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轨迹,因而契合经济史可以更好地理解经济学科的演化和现状,有助于洞察理论本身的发展轨迹。埃克伦德和赫伯特(2001)⁴说:“当经济理论以历史的联系来表述时,学习抽象理论便饶有兴味了。”因此,本书将经济思想与经济史联系起来,契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来探究经济思想的起源,必要时,对一些主要理论或学说的认知思维、研究视角、提出背景、主要目的、适用条件以及应用后果等都做了剖析,从而便于读者真正理解理论。

第二,重视经济思想与人文社科的结合。经济现象本身与其他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经济现象的理解以及经济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社会科学其他分支的知识。①在理论研究上,经济理论是要揭示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实在及其相互作用机理,社会经济现象比自然现象要复杂得多,各种社会现象之间本身就共生地纠缠在一起。②在应用研究上,不仅社会现象本身就是人类观念和行动的产物,而且任何经济政策都必然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利益的分配。事实上,经济学所研究的人类行为及其衍生的经济现象本身就嵌入了文化的、心理的意识,经济学本身也具有强烈的人文性和时空性。因此,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就必须注重社会科学各分支间的知识契合和交叉,经济学的应用实践更是需要其他具体的社会科学知识作补充。希克斯(1987)⁴就指出,“经济史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作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世界大事、思想和技术等历史学家——可以相互对话的一个论坛”。汪丁丁(2008)³¹则写道:“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史课程,其实是要讲解‘社会理论’,也叫作‘社会思想研究’。在经济学思想史这门课程,我们将介绍那些首先是思想家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第一身份’是思想家,其次才是经济学研究者。”因此,本书将经济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对主要经济学家的出身背景和思想起源做了必要的挖掘。

第三,重视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结合。任何理论体系都以一定方法论为基础,因而如何进行方法论选择以更好地认知社会经济现象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就至关重要。一般地,研究方法要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当关注的中心议题变化时,研究方法也就应该发生了相应的改变。显然,在不同时空下,经济学主要关注的议题是不同的,从而就出现了不同研究思维和方法。正因如此,通过经济学说史的梳理就可以发现,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是共同演化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在边际革命前后出现了巨大变化,从而也就引发方法论的革新,并导致经济学学科名称也从政治经济学转为经济学。不过,由于经济学所研究的社会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毕竟存在根本性差异,从而简单地借鉴和搬用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必然就存在问题。正因

如此,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一系列先验的逻辑假定和数理的逻辑推理基础上构建了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但也由此也造成了理论与现实之间日益增大的脱节。因此,本书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其研究对象的演化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从而就有助于读者真正认识和反思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思维。

第四,重视经济思想与现实理解的结合。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规律并完善社会经济体系的学科,“不仅是认识世界而且是改造世界”的致用之学。因此,经济理论根本上必须来自经验事实,并且能够解决现实问题、指导日常生活。相应地,无论是学习经济学理论还是经济说史,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人类世界,尤其是解释现实世界中的社会经济现象。经济学说史也表明,真正有影响的思想都是适应当时的社会经济形势并有助于解决当时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而人类社会的否定之否定发展往往会再度呈现与以前相似的社会情形。琼·罗宾逊曾说过,研究经济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有关经济问题的一整套现成的答案,而是在于学会如何避免被经济学家所欺骗。而通过经济学说史的学习,通过对理论或学说的成因、发展目的以及存在问题的深入了解,我们就可以更全面地认识经济学流派的理论和思维,从而不为暂时的主流经济学观点所欺骗。因此,本书在介绍经济学思想和理论时尤其注重理论对现实的意义,这充分体现在本书所列举议题的衍生思考和鉴识之中。同时,本书还将不同理论和学说进行历时性的比较,剖析它们的时代适应性以及内含的哲学思维和利益导向。

朱富强
2017年10月

目 录

总论	1
第一篇 前古典主义时期	14
主要学说鉴识	14
经典问题释疑	59
基础概念释义	77
第二篇 古典主义时期	80
主要学说鉴识	80
经典问题释疑	148
基础概念释义	183
第三篇 边际革命时期	187
主要学说鉴识	187
经典问题释疑	210
基础概念释义	227
第四篇 新古典主义时期	230
主要学说鉴识	230
经典问题释疑	249
基础概念释义	275
第五篇 现代主流经济学	280
主要学说鉴识	280
经典问题释疑	293
基础概念释义	302
参考文献	305

总 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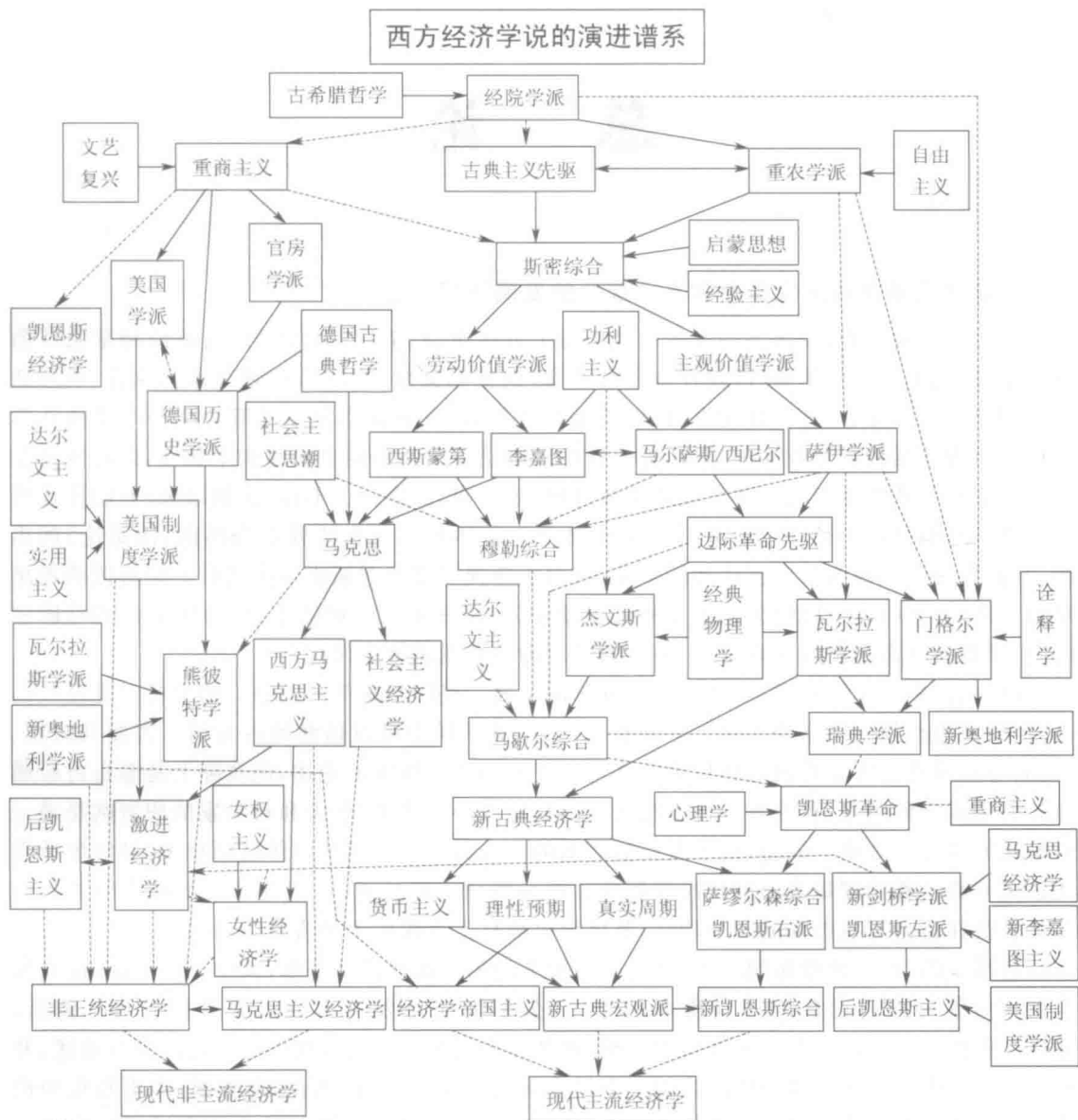
1. 简述经济学的五次革命和五次综合的发展历程。

从经济学说史看,经济学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五次革命、五次综合的历程:重商和重农革命到斯密综合、主观价值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到穆勒综合、边际革命到马歇尔综合、凯恩斯革命到萨缪尔森综合、理性预期革命(以及斯拉法革命)到新凯恩斯主义综合。一个革命性学说往往呈现出某种新颖性和极端性,综合性学说则呈现出强烈的全面性和平和性,以此视角就可以更好地和清楚地审视经济学说的发展过程(朱富强,2016a)。不过,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经济学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并开始形成自身学科体系的分水岭界定为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并将斯密学说视为对以往认知的革命,进而也忽视了那些对斯密学说进行不同解读的零星革命。因此,被(误解性地)公认的发展过程就变为:斯密革命到穆勒综合、边际革命到马歇尔综合、凯恩斯革命到萨缪尔森综合、理性预期革命到新凯恩斯主义综合。

(1)前古典主义经济学:经济学对伦理学的从属。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只是近代的事,但经济思想很早就已经出现。一般地,西方经济学说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例如,尽管现代经济学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并把它归功于斯密的论述,但实际上是源自古希腊自然哲学流派的主张:存在着一种支配社会的秩序或一组规则,学者和科学家的职责则是通过推理来发现这些规则。同时,由于古希腊时期的个人行为 and 城邦共同体密切相关,经济生活就无法离开政治和伦理规范而呈现出强烈的非市场特征。相应地,生活在非市场社会中的古希腊学者往往就会忽视市场的调节功能,其思想也被打上深深的干预和管理烙印。

色诺芬的《经济论雅典的收入》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其中,《经济论》探究奴隶主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产,《雅典的收入》分析如何对奴隶主制国家进行管理。随后,亚里士多德发展了色诺芬的家庭管理思想,将其置于奴隶主国家管理的范围之内进行论述,并在《政治论》中将经济论视为政治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期间,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更是集中论述如何管理国家以使人们的生活更美好,当这种管理的含义扩展到其他事物和城市国家以后就出现了相应的“政治经济学”一词,这是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含义。当然,早期社会中个人行为与其他人的行为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因而这里的“政治”本质上是“社会关系”之意。

尽管古希腊学者已经论述了个人的福利,并参合了很多规制思想;但在随后漫长的古罗马和中世纪,经济思想应世俗生活的抑制而并没有取得较大的发展。直到中世纪后期,由于工业发展所需资金原始积累的需要,才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世俗经济问题的商人和学者,经济活动才逐渐从其他社会活动中独立出来而被专门研究,从而出现了重商主义革命。同时,由于新兴民族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各国为维护本国利益都加强了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因而新兴重商主义就将国家规制思想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了。此时,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先提出了“政治经济学”一词,后来又经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引入到英国。这种的政治经济学已经超出了家庭经济的狭小范畴,开始论述了国家经济参与管理经济的作用,政治一词开始被理解为“国家管理”。



尽管重商主义热衷于从流通领域快速积累大量的金银,但是这种贸易顺差却难以长期维持,而且重商主义依靠国家的力量尽管可以在短期内发展本国经济,但长期来说却弊端重重。其原因在于,重商主义局限于对流通领域的研究,因而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财富的创造问题。这样,就出现了把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并集中于对财富创造和价值理论进行探究的学者,这就是重农主义的兴起。尽管对重商主义的反思最早是由英国的学者如配第、洛克等发动的,但其思想被引入到法国以后才真正形成较大声势的思想革命。其原因在于,法国深受重商主义带来的弊害,因而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批判态度。法国的重农学派是作为重商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两者共同构成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革命,两者的结合最终产生了(英国)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建立。

(2)古典经济学:经济学科体系的独立出现。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从亚当·斯密开始,《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一书成为经济学科发展的分水岭,也奠定了

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体系：自利人假设、自由市场机制和劳动价值论。相应地，斯密的《国富论》被称为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是对重商主义的革命），标志着现代以自由放任为中心的经济学的诞生。但实际上，重农主义才是率先对重商主义思想和政策进行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范式也都已在重农主义学说中得到阐述。因此，更为恰当地说，斯密学说应该被称为经济思想中的第一次大综合，因为斯密自身的创见并不多，更主要是对前人思想的综合。

斯密时期，新兴资本主义经济正力图突破一切旧的传统束缚而获得自由发展。同时，英国也已成为世界上工业最有效率和最强大的国家，并从自由国际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这样，斯密从讨论国民财富的性质着手，并结合英国的时代背景和综合他人的思想，构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基础。其中，劳动价值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自由放任是提高交换剩余基本途径，也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自利假设则是古典经济学对经济现象分析的基本行为基础。也就是说，古典主义反映了当时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对社会发展的要求，其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国民财富如何增长，其基本思路是通过资本积累和分工深化来发展生产。

斯密之后，众多经济学家包括李嘉图、萨伊、马尔萨斯、西斯蒙第、巴斯夏等继承和发展斯密的思想并就斯密理论中的一些矛盾和含糊展开激烈争论，并在他们周围分别形成了一群支持者。这些不同的解读或多或少地构成了对斯密学说的革命，尤其是萨伊、西尼尔等倡导的主观价值革命对后来经济学发展产生显著影响，这是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二次革命。当然，这些革命思潮是多元和零星的，并没有掀起思维上的根本性变革。其原因是，尽管存在思维和理论上的纷争，但诸流派总体上都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自由放任原理和市场竞争在 1776 年《国富论》出版后的 100 年间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学的基本特征。

随后，约翰·穆勒重新组织了自斯密以来的经济学体系，几乎融会了斯密以及后来经济学家的所有的比较有见地的思想，尽可能详细、准确地阐明各种经济观点，并不时补充自己的独特见解。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到穆勒时，已经成为一个内容丰富的庞大体系，穆勒学说也成为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二次大综合（尽管它往往被称为第一次大综合）。同时，从斯密推出“看不见的手”原理一直到穆勒综合体系的形成，主流的古典经济学都信守市场信条，但这种信条在 19 世纪后期随着工业革命推进过程中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间矛盾的爆发而遭到挑战，依次是：历史学派、社会主义学派以及边际效用学派。古典经济学在历史学派和社会主义学派的攻击都坚持了下来，但在 19 世纪 70 年代的第三次边际效用学派的进攻下却迅速瓦解，因而边际主义就推动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三次革命——边际革命（尽管它往往被称为第二次革命）。

（3）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学科的职业化发展。边际革命的标志是三大著作的出版：门格斯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瓦尔拉斯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这三本书独立地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强调商品的价值不是由劳动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人们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同时，主观价值论又引入了边际分析法——也即增量分析——来分析自变量变动引起因变量的变动。因此，边际革命发展了主观价值论的观点，尤其是利用牛顿力学来对个人行为进行微观分析，从而推动了微观经济学的发展，经济理论的研究也主要为全职学者主导。这样，经济学从研究范围到方法论都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这使得古典主义范式濒于崩溃。

不过，边际革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没有能够取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原因是，先驱性革命往往会推翻以前的学术传统，否定前人的成果，但却难以令其向前发展。在经历了两者间的长期对抗后，马歇尔将古典经济学和边际效用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综合，将古典的劳动—成本价值

论和新兴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微观经济学体系。同时,由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把经济学理论重新团结在“看不见的手”的旗帜下,从而被看作是对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和更新,因而又称为新古典经济学,这是经济学说史的第三次综合(尽管往往被称为第二次综合)。

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的传统,但抛弃了劳动价值的理论而代之以效用价值说。同时,它避开对经济现象内在本质的探讨,而采用功利主义态度集中对问题的解决的手段分析,建立了说明价格如何调节经济的微观经济学体系。事实上,劳动价值理论自始至终都是不完善和充满争论的。有人问凯恩斯,他为什么不研究价值理论,他回答说,最广为人们接受的是劳动价值论,但它已经臭名昭著了。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同样以自由放任为主臬,但不像古典学派那样只重视对生产的研究,而是转向了消费和需求,明确把资源配置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论述价格对社会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功能,从而从理论上证明了以价格为中心的市场机制的完善性。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在抽象演绎的路线上构建了边际分析和均衡分析的范式,西方经济学就第一次从方法上独立于其他社会科学,并长期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据统治地位。期间,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但基本上都是在新古典框架下进行。例如,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罗宾逊和美国的张伯伦分别对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体系进行了补充,分析在不同市场条件下厂商的行为。不过,随着技术工具在20世纪30年代后的突破,经济学者开始对一般均衡分析重起兴趣,并将其当作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同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粉碎了新古典经济学有关市场调节完善性的假说。为此,凯恩斯开始对自由放任发起挑战,对古典经济学基础的合理性进行质疑。凯恩斯认为,把经济的自然发展会导致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和其他资源充分利用的教条是错误的,因而他把所有前凯恩斯的经济学都称为古典经济学。

(4)现代经济学: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构建。前古典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学者大多都关注宏观经济,但直到凯恩斯才真正确立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其标志是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理论》。凯恩斯把产量和就业水平联系起来,从总需求角度分析国民收入的决定,并提出了由政府干预经济以保证充分就业的一整套政策和方法。正是凯恩斯通过引入了宏观经济分析,动摇了新古典主义静态而均衡的分析范式。因此,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就成为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四次革命——凯恩斯革命(尽管它往往被称为第三次革命)。从此以后,凯恩斯经济学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成为战后世界各国治愈经济痼疾的良方,而其他反对者也努力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理论与经济政策的紧密结合。

然而,凯恩斯理论本身是模糊的,人们对他的理论阐释也引起很大争议,以至于凯恩斯主义分离出了不同的派别。一方面,凯恩斯并没有提供微观理论基础,因而美国的萨缪尔森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相结合,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或称凯恩斯综合),这成为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四次综合(尽管它往往被称为第三次综合)。此后,萨缪尔森又不断地将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纳入自己的范式体系,从而使得新古典综合派成了经济学的主流,因此又称为主流凯恩斯经济学。另一方面,以罗宾逊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凯恩斯主义左派)坚持将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相脱离,建立以分配理论为中心的经济学。这种分配主义的经济学继承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并由斯拉法进行了发展和完善,他们认为这是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四次革命——斯拉法革命,但这种发展并没有取得主流地位。

新古典综合派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结合起来,但它无法弥补两大理论体系上的逻辑断痕,两者所依赖的基础假设和逻辑推理也不同。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相结合的“滞胀”怪物,而新古典综合派却束手无策。这就滋长了对凯恩斯主义理论进行攻击的思想和学说的发展,这包括货币主义、供给主义、理性预期等流派,这些新兴流派的共同特点就是要求重回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基础——理性逻辑。因此,对凯恩斯经济学形成真正冲击的就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理性预期学说,它带来了经济学说史中的第五次革命——理性预期革命(尽管它往往被称为第四次革命)。并且,以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为主体,构成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它主张重新在新古典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宏观分析。

问题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也存在着致命的两大缺陷:①它的假设前提是不现实的;②新古典经济学运用了大量高深的数学和计量经济学建立复杂的模型而很难被人理解、接受和推广。特别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实践效果并不好,经济长期衰退的结果使得许多经济学家重新开始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不过,这些经济学者也借鉴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假设,而为传统凯恩斯构筑了微观基础,当前重新振兴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观点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这成为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五次综合(尽管它往往被称为第四次综合)。尽管新凯恩斯主义和传统的凯恩斯综合都是积极吸收新古典宏观派的一些分析工具、政策主张,但两者也存在很大的不同,因为新凯恩斯主义更致力于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从而具有更加严密的理论风格。

2. 经济学说史对现代经济学教研的意义?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渐进的,学术史对任何学科的理论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科尤其如此。事实上,对经济学说史的梳理,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更全面地理解经济学科的发生、发展和现状,并从中可以分析经济学科发展的基本方向。同时,也有利于将经济理论与特定的社会背景相联系,从而更好地理解认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结构。关于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对理论研究的意义和作用,内维尔·凯恩斯(2001)¹⁷⁸归纳了这样三个方面:第一,证明和检验那些本身不依赖历史材料的研究结论;第二,提醒人们注意经济学说的现实应用性的局限性;第三,为理论化的经济学说的逻辑结论提供一个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对现代经济学正确而全面的理解首先要从经济学的教学开始,需要重视经济学说史的学习和研究。

(1)认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对象。一般地,由于受习惯、舆论以及教育的影响,人类的认识往往存在盲点,导致对眼前的事物反而无法认识清楚,即“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斯宾塞(1996)⁷⁶⁻⁷⁷就指出:“人要把自己从习惯与教育加在他智力上的无形桎梏中解放出来是如此困难。因此,一个满足不能胜任对它本身及其行为和信念进行准确的判断,这一事实是如此明显,以致它具体体现在这一警语中——没有任何时代能写下它自己的历史。”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几篇时时更新的热点讨论文章就以为了解了经济学理论,或者给予一些抽象的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就以为认识了经济规律、社会现象,乃至由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开出具体的药方;相反,只有通过经济学说史的学习,我们才可能更全面地把握经济学的目的和内容,并通过客观的思考而为现实问题的认识提供启发。

事实上,通过经济学说史的学习,我们可以理解到,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对象本身就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变迁过程:在重商主义时期,人们关注的是如何从流通领域中为国家获取货币财富,重农学派开始把财富从流通领域转向了农产品的生产,古典主义则基于劳动价值论

的角度开始注重国民财富的创造问题,新古典主义以后人们才把研究的视角转向人的需求和偏好方面。也就是说,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是适应时代特质而有所不同的:从研究家政管理到国家管理、从研究物质资料的生产扩展到研究所有的货币交换关系再到人类的全部行为、从研究财富的增长到经济人基础上的利己主义思维的形成再到所有的非物质财富的分析。

当然,不管如何,早期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是广泛的,研究经济行为和社会现象的视角也是多样的。正因如此,阿马蒂亚·森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伦理学,二是工程学。从经济学的发展史来看,这两大内容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共同构建了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大厦。这两大内容也是不可分离的,究其原因,经济学是一门致用的科学,它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这必然涉及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两方面的关系。譬如,财富的分配、制度的设立、产权的界定以及贫困、异化等问题,都存在一定的价值判断,这实际上就是伦理问题。然而,自边际革命之后,主流经济学越来越强调“科学化”,越来越独立于其他学科,以致研究的内容和视角也越来越窄。早先的新古典经济学把研究对象仅仅限于稀缺性资源配置问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尽管研究领域有所拓宽,但却依旧承袭了新古典的自然主义思维。

可见,通过对经济学说史的梳理,我们可以更真切地认识到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之变迁,通过这种内容的全民审视认识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狭隘性。同时,还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抽象理论和抽象思维与具体的社会实践之间是如何出现如此大差距的,那些仅仅把经济学当作一门工程学的经济学家为何难以成为杰出的经济学家。事实上,对经济学理论和社会发展实践起过重大影响的那些经济学大家几乎都是服务于他那个时代和社会,并且对社会制度的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而这些学者往往拥有渊博的知识。

(2)理解现代经济学的二元体系结构。人类的行为受心理、文化的影响,经济行为与其他社会行为也必然不可分裂地结合在一起,因此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研究本身就不能脱离其他学科,这一点在经济学说史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事实上,早期的经济学本身就属于政治学或伦理学,早期的经济学家通常也是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如斯密、马克思、穆勒等都是如此。从根本上说,正是由于早期经济学关注的是国民财富和社会利益等公共领域的问题,关注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改造,因而经济学被恰当地称为政治经济学。后来,只是当经济学将研究重点转到私人领域,并撇开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等问题而集中研究个人最大化效用,政治经济学才相应地转变为经济学。

当然,不管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对象在不同时代的侧重点如何不同,工程学和伦理学是任何时期的经济学都不能偏废的,因为经济学本身必然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工程学和伦理学这两大内容实质上大致构成了当前中国两大经济学分支:政治经济学主要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层面,分析具体社会关系下的人类行为;西方经济学主要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并把人从具体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这是由于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各有侧重点,从而也就都有片面性: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研究对象限于稀缺性资源的配置,而缺乏对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真实互动关系的互动,它可以解决物质资本的配置问题,但对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等新兴资本的研究却相对无助。同样,政治经济学往往过于强调人的主动性,而对经济运行中的自然规律相对认知不足。但是,两者又都统一于经济学研究范畴之内,并体现了某一方面、某一视角。因此,两者本质上是互补的,是可以相互促进,并且可以进一步在一个统一的基础上进行契合的。

不幸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两者的关系却存在严重的误解。一方面,一些学者往

往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强调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对立,并将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截然分开。在早期,政治经济学极力排斥西方经济学,而随着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引入,政治经济学又被西方经济学排斥到人文学院或马克思主义学院,而经济学专业几乎只剩下了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经济学说史却表明,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统一的学科,它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福利提高,从而必然包含非常广阔的内容。另一方面,中国大多学者想当然地把政治经济学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它的研究内容就是《资本论》的研究内容,而这种传统政治经济学过于关注生产关系和所有制问题,而忽视了对一般社会关系下微观行为的研究。经济学说史却表明,这种划分是庸俗和肤浅的,也不是历史主义的。事实上,马克思经济学只不过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或者是一个重要分支。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早期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物质资源的配置。显然,在资本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和物质作为福利的古典时期,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界定是合理的。同时,基于这种界定,后来新古典经济学逐渐集中于私人领域问题,关注物质资源配置问题,这种发展趋向也有其合理性。但是,纯粹的私人领域的问题并不值得学者花费如此的精力,因为它根本上只是提高个人的理性以及提供足够信息的问题。事实上,学者们考虑的根本上不能局限于私人领域,而是要关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而且在社会经济问题中,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是纯粹私人的。正因如此,我们通过对当代经济学流派的学习可以发现,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学术界也不是已经成为历史的名词;相反,它仍是一个重要的思潮或流派。且不说政治经济学是激进主义学说的基石,即使如西蒙、布坎南、森等主流经济学家也都将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的重点或经济学的核心。

可见,通过对经济学说史的梳理,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经济学的结构,尤其是理解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者二元体系,并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说,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是互补的,两者的分裂仅仅是在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而且,不仅经济学的两个分支之间是互补的,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各分支之间也是互补的。正因如此,经济学的发展需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契合,社会科学的发展也需要建立在各个社会科学分支之间契合的基础之上。

(3)识别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适用范围。一般来说,社会科学理论本身就体现了观察主体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从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事实上,不同个体的知识结构和文化心理不同,观察的角度也往往有异,从而发现的问题和得出的论断也就不同。同时,时代背景不一样,社会大众的认知不一样,那些曾广为接受的理论也会发生相应变动。因此,我们在理解现代经济学及其理论的适用性时,就必须对它提出的背景、目的、立场等有清晰地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对经济学说史的梳理,可以有助于提高对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之适用背景的认知,从而避免经济学教材中那些“原理”的滥用。

凯恩斯曾指出,在经济形势迅速变化的时期,新的经济思想一旦被广泛接受就已经趋于过时了。然而,一些盲从于主流信条的经济学家却往往把那些适应于某一特定时代并服务于特定目标的思想错乱地用于另一时期并服务于它们并不适合的目标,从而产生时代和目标以及场合的错乱现象。斯皮格尔(1999)就列举了一些时代错乱的例子:将显然是旨在促进民族国家发展的重商主义政策用于此后已经充分发展了的民族国家,将支持农业价格的重农主义政策用于此后农产品已出现剩余的世界,在公共产品的需求已经极为提高的时代应用于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教条,或者将适应于完善市场机制的新古典主义应用到需要政府发挥经济作用的发展中国家,等等。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不仅当前国际社会经济形势在迅速变化,而且中国

社会经济形势更是不同于欧美社会。因此,无论是套用教材上的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还是搬用西方的“前沿”理论来解决中国社会的经济问题,都会造成“邯郸学步”的后果。

事实上,由于任何时代都有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而产生了特定时期的主流经济学。但这也意味着,主流经济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比以前更为进步的。在很大程度上,对经济学说史的梳理就有助于提高对经济学说的演变以及主流和非主流之更替的认识,从而能够使我们的认知不为短期内的主流观点所左右,并更深切地感受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适用条件和时代背景,从而防止可能的错乱现象。譬如,通过经济学说史的梳理,我们可以认识到西方经济学采用功能主义分析方法的理论发展和历史背景,并进而认识到主流经济学走向形式主义道路的原因。实际上,现代经济理论中“为形式而形式”的取向,就是西方社会日益膨胀的工具理性与个人主义相结合而产生机械理性主义的结果。在这种形式主义追求下,越来越强调实证主义,在数学上也越来越优美和典雅,甚至可以和物理学的最好理论相媲美。但是,尽管这种形式主义使论述的严格性增强了,但真正的新思想越来越少。

此外,从经济学说史的梳理中,我们还可以更清晰地识别出在对现代经济学认识上所存在的误区。譬如,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被认为是承袭了源自英国的新古典经济学,但经济学说史却表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思维已经法国化了,抛弃了英国的演化理性传统,而移植了欧洲大陆的建构理性传统。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理论基本上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及其现代版本为基础,崇尚均衡的分析和最优化的机制设计,这使得现代主流经济学具有强烈的建构理性特性。再如,现代主流经济学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而推崇市场机制,甚至走向了市场原教旨主义,但是经济学说史却表明,新自由主义概念却首先出现在19世纪末,它在坚持民权和自由的同时又乐于依赖公共政策以解决那些市场不能克服的经济问题,要求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来保障大众的社会福利,显然这与现代主流经济学所理解的新自由主义概念截然不同。

可见,对经济学说史的梳理,我们可以更好地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适用范围,防止这些“原理”的滥用。同时,也可以更清晰地识别主流经济学的演化,认识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所处地位的历史变更。事实上,主流的东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一定是对的;恰恰相反,那些后来成为主流的东西都是从非主流开始的,并且通过扬弃,那些已经被抛弃的理论可能会再次获得认同。

(4) 提高对流行经济信条的鉴别能力。一般地,那些对人类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往往都是适应于特定时代。布鲁(2003)³就指出,“斯密做出了巨大贡献恰恰是因为他的思想回应了那个时代的要求……如果凯恩斯是在1926年而不是1936年出版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理论》,相比而言,它所吸引的注意力就会大大减少。”同时,任何一个基于特定环境所生成的理论都不是一般理论,而毋宁说一个特殊理论。显然,这种特殊理论具有极强的应用局限性。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只能思考在奴隶制既定存在的情况下的自给自足经济中的奴隶劳动的配置问题,最多考虑一些简单的交换。阿尔都塞(2001)¹³⁹指出,“亚里士多德不能从价值形成本身看出,在商品价值现实中,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动,这是因为希腊生活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之间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同样,斯密以及马克思对劳动市场性质的界定以及由此发展的劳动价值理论就具有非常明显的局限性,因为他们都把直接的物质生产劳动作为是生产性劳动,这仅仅是与当时人们对物质的追求以及国家竞争中直接表现为物质财富相适应的。事实上,随着人们的需求从物质转向服务、转向精神满足等方面,传统理论的局限就日益凸显了。

因此,作为后来者,我们的学术任务就在于要尽可能地摆脱传统理论的束缚,通过对学说

史的了解来反思流行的分析框架和思维。事实上,不仅每一个思想都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而且理论本身往往也是在争论和反思中逐渐发展成熟的。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教材却将这些历时性发展的理论共时性地排列在一起,从而使得人们往往把那些过去的特殊理论当成一般性理论,从而意识不到受到过去思想的束缚。那么,如何才能摆脱过去思想的束缚呢?这首先要对过去思想的适用性有足够的认识,尤其需要将这些思想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认识。事实上,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智慧和流行观念很大程度上都源于那些以往的思想大师,而现代主流经济学教材却忽视了他们的不足和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经济学说史的梳理和学习将会有助于更好地审视这些思想,经济学说史中所存在大量的史实对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大有裨益。

这可从两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现在流行的思想往往都是前人基于其特定时代背景的理论总结,从而很可能并不适应当前的环境,因此我们必须具有相当的批判精神。经济学说史上的许多学者都强调了这一点。例如,凯恩斯(1999)³⁹⁶⁻³⁹⁷就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讲求实际的人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使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灵感的当权的狂人,他们的狂乱想法不过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另一方面,它使我们明白,正是由于思想的发展是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因而不能简单地以现在的理论去判断当时的思想和政策,而且这些思想和政策很可能获得新的应用。事实上,重商主义曾经为欧洲各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指导,但到了18—19世纪却遭到了休谟、魁奈、斯密、李嘉图等人的大力批判;而到了20世纪后又经历了一场复苏,凯恩斯重新称赞重商主义者论证贸易顺差产生的需求将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而且促进日本以及东亚四小龙经济增长的政策很大程度上也属于重商主义。

此外,人类的经济思维本身是与其他社会活动分不开的,经济学本身就是整个社会科学中的一部分,只是到了人类的经济活动占了其总活动的很大一部分,经济研究才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并出现重商主义以及重农学派等。关于这一点,对经济学说史的梳理同样大有裨益,那些从事经济学说史研究的学者往往体会更为深刻。斯皮格尔(1999)就写道:“那时的经济学反映的是民族文化的明显差异,并且与时间和地点等条件的差异密切相关。只是在过去50年间才出现了一种世界范围的单一的大众文化,并且在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下,接受数理经济学之风横扫世界,影响所及,将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国民差异都抽象掉了。”

可见,对经济学说史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提升对传统智慧和流行信条的鉴别能力,有助于在将教材上的理论应用到具体实践时更好地慎思它的适用前提,从而避免教条主义的错误。事实上,任何人的思想和行动都会受到传统智慧和流行观念的束缚,而要尽可能地避免这种限制,就需要跳出主流定式思维。当然,要跳出主流定式思维,又有赖于通过经济学说史梳理以深化对此缺陷的认知。所以,凯恩斯指出,“对思想史的研究是思想解放必经的开端”(转引自克拉克,2001)²⁵。

(5)拓展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视角。一般地,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史,与自然科学在对待其历史的态度上有相当大的不同:自然科学家大都相信,在其先辈们从事的工作中,几乎没有湮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经济学家却往往相信,经济史和学说史中却存在很多被忽视的思想,这些思想很有启发性的,可以启发我们的心智。显然,这是经济学说史学家常常会碰到的。例如,埃克伦德和赫伯特(2001)²³⁷就写道:“像古诺、杜普伊特、伦哈特等人的成就在拖延了如